

序

李长林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在世界上可谓独树一帜。但文化
是抽象的东西，
它必须有载体才能表露出来。
最主要的载体是文人，
有文化的人。
而文人又必须借自己的行动和著
作，把文化呈现出来，流传下去。
这一套《东轩书趣文丛》
是一套别开一面，独出心裁的书。
它以文人为主体，
表现中国文化的多彩多姿。它是
以简洁鲜明的文体，
生动活泼的意象，
通俗而又深刻地表现中国
文化的各个方面。

东轩书趣文丛

9

浮世代代传

——海派文人说略

李嵘明 著



华文出版社

东轩书趣文丛

浮世代代传

李嵘明 著

海派文人说略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世代代传/李嵘明著.-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2
(东轩书趣文丛)

ISBN 7-6075-0563-4

I. 浮… II. 李…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上海-现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3609 号

浮世代代传

著 者: 李嵘明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 方 舟 张惠军
封面设计: 刘林林
装帧设计: 文 珺
经 销: 新华书店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 话: 63096781 63097990
邮 编: 100800
印 刷: 北京国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8.25
版 次: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50 册
书 号: ISBN 7-5075-0563-4/Z·129
定 价: 16.00 元

华文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华文版图书, 印装错误, 随时退换

《东轩书趣文丛》

顾问：季羨林 周一良 邓广铭 袁行霈

策划：鄢书平

主编：严平 洪宜山 方舟

主审：吴修书

编委：杨必君 刘济社 苏登高

张方 张宏 郑柯

王学泰 汪春弘 孙克强

张耀南 郭榕 谭明仪

晓怡 阳仁生 张惠军

陈赓灿 高建中 蔡永生

审稿：邵铁真 徐顺生 应祥烈

朱京 杨双才 石斌

李珉 邹英毅 王德意

责任校对：常再昕

(排名不分先后)

《东轩书趣文丛》序

季羨林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上可谓独树一帜。

但文化是抽象的东西，它必须有载体才能表露出来，最主要的载体是文人，有文化的人。而文人又必须借自己的行动和著作，把文化呈现出来，流传下去。

这一套《东轩书趣文丛》是一套别开生面、独出心裁的书。它以文人为主体，表现中国文化的多彩多姿，花团锦簇。它不是高头讲章，不是枯燥无味的“中国文化概论”，这样的书让人望而生畏，读而味同嚼蜡。它是以简洁鲜明的文体，生动活泼的意象，通俗而又深刻地表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它是一套好书，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是为序。

1996年12月10日

目 录

一、海上传奇不奇

1. 海派的活力 (4)
2. 海派文人世界..... (17)

二、海派的诞生

1. 奇书《何典》 (48)
2. 阴暗的谴责 (58)

三、趣味主义的狂欢

1. 以恶意制服恶意 (75)
2. 哀情与言情 (82)
3. 武侠与侦探 (95)

4. 包天笑·张恨水·秦瘦鸥 (113)
5. 鸳蝴文人：保守的逍遥 (128)

四、激进主义过场

1. 性爱无边 (142)
2. 分解感觉 (159)

五、市民主义 ——神秘的平庸

1. 浪漫文人风情空好 (198)
2. 躲避精神的女人 (209)
3. 男人生活 (221)
4. 灵光中的张爱玲 (236)

1

海上传奇 不奇

HAISHANGCHUANQIBUQI

在秘密还没有公开时，从文学中显露出来的上海，看上去不是一个能躲避其精神惶恐的世界。但在这本书里，我想讨论一些特殊的人，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实现了这个目的。1832年，上海第一次发现西方的文明与傲慢（见本章附注）。从那时起，上海既被认为发展着中国现代化可能有的希望（罗兹·墨菲），同时也通常被指责为道德最堕落的地方。在文学中尤其困扰着对后一种情形的忧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的左翼文学一直攻击这个城市现实的失败，并鼓励人们斗争。充满自由主义理念的作家大多逃离这个城市，并遥远地表示蔑视。而附骥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学则洋溢着没有人相信的为个人意志力赞美与辩解的热情。自由主义可以看作一种出路，小说的政治用意可以看作是所能寻找到的上海的另一种精神出路。一个共同点是，所有的寻找都基于对上海现状的强烈不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甚至民族主义文艺的鼓吹者中，没有人认为上海可以以现有的平庸方式存在下去。他们中的大多数则并不考虑一个市民迁就或者抵抗生活与欲望要求的琐屑状况，而更关心讽刺上海那种道德腐烂的情形以及探索如何蜕化与演变。左翼在这方面设置了最令人神往的前景。

本书中讨论的这些文人，除了偶尔几个不重要的例外，都拒绝使文学向个人的抑或是社会的理想主义敞开，而且拒不承认精神的支配地位。从张南庄——他在滑稽地模仿了人类的庄严行为后便一无所事——一直到张爱玲的作品，都强悍地维系着人与生活之间的平庸关系，而不是人与精神之间的崇高关系。中间经历了有代表性的文人，如臭名昭著的性爱

至上论者张资平，鸳鸯蝴蝶派文人张恨水以及热衷于新感觉主义的少年天才穆时英，他们只不过把这种关系进行了变形处理。那些缺乏精神照耀的人物在《金锁记》(张爱玲，1943年)的一个著名场景中被这样描述下来：“停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这种彻底的拒绝的结果，便是人平衡生活的不安定状况，使它更利己地延续下去的愿望，取代了人改变生活环境及自身堕落的努力。依赖于此，他们有效地消除了人的现实惶恐。正是这种惶恐促使人们渴望从精神上拯救这个世界。

绘画与戏剧界的“海派”的称呼，在移用到这些文人身上时便成了一个更多带有贬意的词语。但没有更确切的称谓可以用来概括这些不关心精神的作家。

1. 海派的活力

精英知识界与民间文人

“海派”文学的涌现，从根本上说出于一种虚幻的勇气：希望在文学内部发展一种与远离现实处境的理性玄想相对的力量。从传统儒道理想的继承者一直到后来的京派田园主义文人，都把这种玄想神圣化了。但1917年的文学革命赋予小说庄严意义之前，这个命名除了大致用以抗拒令人厌倦的士

大夫情趣，也表示讽刺某种程度的商业习气。因此它有可能源于民间文人有欠高雅的写作方式。

一些学者试图为其寻找高贵的精神源头。在徐光启（1562—1633年）闪烁着实用主义光芒的一生里，具有近代化性质的证据发现了，但缺乏进一步说明徐在上海史上的影响力与感召力的绝对把握。而且与徐同时代的文化科技人员同样出现在另外省区中。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期，上海的公共意识形态并未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发展特征，去支持违背儒道传统的文化形式。但民间却产生了另一种文学，它既不像儒家那样具有古老的社会道德的正义感，也不强调如何巧妙地保全自我精神。

上海是在它作为民族屈辱的符号的岁月里崛起的。由于帝国资本的刺激，上海看上去脱离了中国社会的旧有轨道，奇迹般地发展了近一个世纪。不过这个神话世界的形成也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对知识界来说，传统的既得利益者时刻都处于被甩脱它的发展进程的危机之中，而激进者则充满了不被理解的忧伤。王韬（1807—1897年）的一生遭际，典型地困扰着近代精英分子回应现代化探索时所感受到的巨大不安。他从翻译西书求西学开始，“由才气横溢的封建士子一变为洋务秀才，再变为因向太平天国上书献策而遭清廷追捕的‘长毛状元’，终变为因怀才不遇、放言狂行而名闻上海的狂人名士”。

但激进派的痛苦、紧张及其作为精神性动力的民族危机意识并非“海派”发展出来的特点。任何文化的保守与折衷主义或激烈的精神冒险后来都不大可能为公认的那些海派文

人所接受。认为王韬或者龚自珍——那个时代众多狂放天才里最出名的一个，确立了海派的开放品格并不令人疑虑，然而，就他们具有精神向往的特征而言，一个极端保守分子也可能同样地捍卫他的精神信仰，而后来的海派文人则无情地拒绝了精神庇护；因而他们无法涵盖这一派文人发展的心路。

造成这一局面的症结在于，二三十年来自北京的批评已将“海派”的含义固定下来了。本书将在下一节里讨论京海论争的过程。它的结果是，“海派”被压缩成一个用于描述上海装模作样与精明自私风格的令人不快的语汇，而表现其他文人严肃贡献和先锋精神的特征从此完全流失了。

虽然这种简单的定性有很大的缺陷，但它有益于将上海原先的文化缠绕状态整理清楚。上海的精神探索型文化与非精神的消费文化一向互激互荡，此生彼长。排除龚自珍的改良主义文学、鲁迅的启蒙主义文学，而将孙家振热衷于放纵生活的观念、张爱玲的市民主义感情凸显出来，将损害我们对上海的整体理解，但由此可以看到一个普通人的上海。

从这种狭隘的意义出发，现在普遍地把孙家振的《海上繁华梦》视为“海派”近现代发展的轻佻的源头。不过，鉴于其缺乏观念的启示力，我们也许更应重视光绪五年（1879年）问世的张南庄的《何典》，一部土生土长的奇书，其中隐含了大体上未受流行教育干扰的上海乡俗的智慧。正是它的某种龌龊感使我们无从怀疑它的真实性，而抛弃所谓“伟大意识”的严厉作法也能获得当代的同情。《何典》与后来海派注意力的相似之处在于，它嘲笑了文学向上的精神性要求，并以向下的冷漠的生理性趣味取而代之。因此，它还消除了有可能导

向某种精神满足形式的性欲的力量。

张南庄更多申明了他对于无论是传统、现代还是未来文学中总是受到崇拜的神圣写作的蔑视，即使他的破坏力缺乏有效的连续性。“海派”同样表达了对于所有要求文学严肃起来的主张的反感。但海派的繁荣并不是以更深广地继承《何典》的方式达到的。《何典》也远非一部能够激发他人摹仿欲望的作品。小说内部的无深度的对抗使得它的讽喻欠缺传统上愤世嫉俗的力量。海派是在一种民众的，而不是精英分子的趣味上接近了《何典》，例如后者对浅薄与滑稽场面的嗜好正是促发鸳鸯蝴蝶派文学狂热的因素之一。

商化与现代质

由《何典》开始的消解精神的尝试，已有意识地表现出了轻辱中国“士”文化的现代性意向，并日益发展出回避崇高性质的奇特写作。但关于海派文学特征的看法一贯见仁见智，下面是两种有影响的观点。

1933年，鲁迅在京海正面冲突之外为海派预设了“商化”的背景——同时也针砭“京派”的“官化”背景。虽然20世纪最初的岁月里，很少有人能意识到文学应向普遍与诚挚的人性方向发展，但到二十年代，“商化”倾向已深深刺激了艺术至上论者。鸳鸯蝴蝶派，海派规模最大的流派，终于因被认为是商业机制运作下产生的向市民主义趣味屈服的文学而遭到抨击。茅盾认为他们“思想上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1922年）

但这种流派的活力为最初的批判者所未预料到，鸳鸯蝴

蝶派一直比新文学更能激发市民的热情。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三十年代初，上海书店的广告几乎习惯性地把张恨水的书目置于比鲁迅与巴金的著作更醒目的位置。市民的支持以及一向有利可图，使这个在理论上一败涂地的流派很少反省趣味主义有何不妥之处。

另一种观点认为海派应具有“现代质”的内涵。也许有观点的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争议，它断然将鸳鸯派排斥在海派之外，“所谓海派文学，第一，它应当最多地转运新的外来的文化。第二，迎合读书市场，是现代商业文化的产物。第三，它是站在现代都市工业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国的现实与文化的。第四，所以，它是新文学，而非充满遗老遗少气味的旧文学。这四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是海派的现代质。”（天福辉，《在都市漩涡中的海派小说》）鸳鸯派显然匮乏这种“现代质”的含义。

海派的“商化”倾向确实严重。不过，尽管我不想枯燥地涉及上海的出版业及其庞大的读者群如何形成，但利润的目的无论如何早在明朝末年中国第一次通俗浪潮中已被强调为写作的首要目的。当时，上海在整个中国文化业中还无足轻重。由于利润及读者的推动，鸳鸯派与四十年代市民主义都市文学的运作机制能够以超乎文学理想的形式在任何一个地方建立起来，情形正如当代表明的；而非海派独擅其长。

因不合“现代质”的概念而拒斥鸳鸯派七八十位有名的文人，不仅使海派阵营损失惨重，还割离了海派的历史。鸳鸯派的垄断市民文化市场引起北京的厌恶，才在后者的评论里出现了“海派”的讽刺性称谓。为了将向现代文体靠拢的

张资平之后的文人与鸳鸯文人区别开来，沈从文又发明了“新海派”一词，以表明海派的恶习正在变本加厉地演化。

虽然新感觉派与张爱玲已企及了一种主动的与内省的现代品质，但新感觉派的首创者刘呐鸥从一开始就试图消除对日本同类实验的依赖，而不是更多地“转运”。张爱玲是在她罕见的生活直觉的支持下接近弗洛伊德主义的，因为这种特征在她看来还不能理解精神学理论的少年创作中已流露出来。另外，工业化都市品质不是仅仅出现于上海的孤独的品质，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燕卜逊教授的学生也创造了中国现代主义的真正成熟的形式，有人甚至挑战性地把他们的领袖穆旦视为 20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现代派诗人。

当然，设想从所有的传统趣味主义者、性爱的鼓吹者、热衷于精细地分解人类感觉的实验小说家、以及迷恋庸常生活细节的女性写作者公认的海派作品里谋求一种共性也许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怎样的看法都将被迫保留一些例外的情形。认为拒绝了鸳鸯派的海派将显现出都市化写作倾向的看法也要面临困难，比如它对施蛰存的《上元灯》无可奈何。就我这本小书的立场而论，试图在与精神性叙事的不协调的对立中，发现海派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与激情，也将保留一些例外。

隐私与活力

从 20 世纪最初几年开始，鸳鸯派便处于一系列为人忽视的变化中。这些变化缓慢地将海派与作为其精神源头的晚清小说隔离开来。为了使悲剧更富有实感，徐枕亚无意中创造了中国第一部日记体长篇小说《雪鸿泪史》。《广陵潮》《李涵秋

著)经历了漫长的写作过程,在此期间爆发的政治事件被作者机智地编织进他自叙性的爱情故事中去。随后程小青把惊险的侦探故事当作生活中真实遭遇过的灾难来写。他们看上去有预谋地强调了小说的事实性。在此之后,张恨水的《金粉世家》虚构一个高高在上然而腐败不堪的总理府时,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向小说移植当时一些风云际会的政客名流的秘闻。有些小说家直截了当地否认小说的虚构性质,“余耆是书,意别有在,脑筋中实并未有小说二字,深愿阅者勿乃小说眼光误余之书,使乃小说视此书,则余仅为无聊可怜随波逐流之小说家,则余能不掷笔长声,推心痛哭”(徐枕亚,1915年)。

作家迫不及待地发誓自己所写的是真人真事。他们的目的当然在于承诺一种可以信任的风格。尽管其承诺很可能一文不值,而即使最不成熟的读者也可能对接二连三的誓言产生怀疑,但并不会有人去认真追究作者的不诚实。因为融入纪实成份对那些刚刚培育出小说欣赏力的人更有刺激力。继徐枕亚的信誓旦旦后,无数漏洞百出的小说在类似的保证下风行一时。然而,广泛地接受小说更应是一种虚构的观念也并未改变人们的纪实性的兴趣。徐卓呆很快开始讽刺一些缺少虚构能力的文人(见《小说材料批发所》),但没有人放弃这样的写作与阅读偏好。时常假托个人身世不幸的哀情小说热衰歇之后,文体最自由与荒唐的武侠小说也乞助于历史的野逸传闻直至正史的资料作为其可信性的凭证。海派读者与作者洋溢着这股在虚构与纪实间设置暧昧不清的联系的热情,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末其消亡之前。当人们追问苏青《结婚十年》的悲剧是否属实时,她无疑会为小说从真实情爱经历